

跨文化研究如何“跨”？

周 宪

摘 要：跨文化交往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趋势，跨文化研究应运而生。跨文化研究如何实现“跨”，既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多元现代性理论揭示了不同文化多样性和特异性的历史根源，但如何超越本位文化的局限性去理解他者文化，却是一个难题。本文以“文商”（CQ）概念为契机，结合发生认识论和哲学阐释学，论证了跨文化研究之“跨”的三种视域，强调异中探同并同中证异的视域融合乃是实现“跨”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跨文化 现代性 轴心时代 文商 视域融合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令人深省的话，他说：“世上有两个事物是无穷无尽的，即宇宙和人之愚蠢。不过关于宇宙我尚不能完全确定。”^①爱因斯坦的意思很清楚，宇宙的无穷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但人之愚蠢无穷无尽则是确凿无疑的。人之愚蠢时常可见，在跨文化交往及其跨文化研究中也时有所现，各式各样的愚蠢像是根深蒂固的习惯，难以克服，其中尤以本位文化优越论及其民族偏见最突出。^②

如何克服跨文化的误识与误解或偏见呢？古训说得好，“知己知彼”矣，既了解自己又知晓他者，这显然是减少误识与误解的一条路径。晚近流行的说法是“文明互鉴”，该词成为2019年中国十大“热词”之一，连国家领导人都郑重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① Alice Calaprice, ed., *The Ultimate Quotable Einstei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1), 478.

② 参见〔清〕斌椿：《乘槎笔记》（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其中记录了很多晚清国人出过门看西洋景的误识与偏见。

鉴而丰富。”（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的演讲，2014）从古代智慧的知己知彼，到当代智慧的文明互鉴，其实都关涉跨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或看待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关系，而理解这一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跨”出自我的局限而达致文明互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人文学者所提倡的“跨文化研究”大有用武之地，通过跨文化研究可以减少甚至克服文化偏见，真正实现文明对话和互鉴。如今，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之一，在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学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纷至沓来，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和理解。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展，本土的跨文化研究必有大发展！

一、跨文化与文化特异性

俗话说得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亦涵育一方文化。现代性催生了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了文化流动，每一文化的特异性作为他者出现了。按照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①。这一说法隐含了某种判断，即传统社会的多元性被源于西方现代性同质化了。换言之，全球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取消了其他非西方文明的特异性。这种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晚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即使在西方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以色列社会学家霍夫斯塔，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代性是多元的，而且这种多元现代性导源于

①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页。

“轴心时代”的文化奠基时期几大文明。于是，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成为论证多元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根据亚斯贝斯的研究，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尤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精神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一直到今天人类仍立足于这些古老文明的精神气质。此一时期他名之为“轴心时代”，出现了孔孟老庄，佛陀、诡辩派和虚无主义，伊朗祆教，巴勒斯坦先知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希腊智者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更重要的是亚斯贝斯发现，这些伟大的古代文明走过了各自的极盛时期便慢慢衰落了，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不断地出现各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仍旧不断地指向伟大的“轴心时代”。^①

亚斯贝斯为现代性的跨文化交往和研究提供了别一种思路，那就是每个伟大的文明都是从自己的本源性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发展亦复如此。基于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艾森斯塔明确提出现代性不是要消解传统，毋宁说是把传统当作重构现代性的前提条件，由此发展出各自独特的反应模式、善的观念和社会体制。^②他还指出，文明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仍然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复杂关系，其中充满了持续不断的竞争，所以不同文明在全球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大相径庭。^③

我以为，“轴心时代”是我们追溯文明本源的理据，而现代性是我们思考当代跨文化研究的基本视角。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及其交互关系，正是在多元现代性的构架中生成并发展的，当代全球化情境乃是“轴心时代”伟大传统的产物，这正是亚斯

^① Karl Jaspers, *Way to Wisdom: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5-40.

^② Shmuel N. Eisenstadt, et al., "The Context of the Multiple Modernities Paradigm," in Dominic Sachsenmaier and Jens Ridel, eds.,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Leiden: Brill, 2002), p.10.

^③ Ibid.

贝斯和艾森斯塔所揭橥的现代性的本质。从“轴心时代”的过往传统到“多元现代性”的当下现实，跨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和复杂，文明互鉴日益彰显，但现代性并没有取消不同文明的特异性和历史传统，世界并不像吉登斯所预言的那样成为西方模式的同质化产物，中国崛起的事实证明了文化特异性的本根性和重要性。由此来看，跨文化之所以可能乃是由于有不同文化各自的独异性。正是这样的差异性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也正是这些差异性导致了互鉴的需要。

二、文化特异性与自我中心

从文化特异性延伸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那么，如何看待自我和他者呢？知己知彼如何进行呢？

人类文明的历史一再表明，文化特异性既是使自身有别于他者的根据，又有可能遮蔽对外部世界及其自我的认知，因为文化特异性常常导致这样或那样的自我中心论或本位文化优越论。透过自我的眼光来看世界和他者，并据此来评判臧否其他文化，往往会形成隐蔽的或显著的文化误解、误识与偏见。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有所助益。他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知识和权力从不分家，两者的合谋是通过确立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而操演的，诸如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理性与疯狂、健康与病态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构成了赞扬一方而贬抑另一方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各种各样的阐释原则和信仰团体，这些范畴便以知识和文化的名义，实施着权力的功能。^①比如，西方学术界流传已久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就是从西方文化优越论出发，依照西方意识形态来建构的“东方”形象，以确证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合理性。于是，“东方”好比戏剧中的丑角一样，总是配套地服

^① See Michel Foucault,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48-163.

务于表现西方主角的伟大与卓越。萨义德深刻地指出，“东方学”不过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它已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①最近国内外学界的热门话题“汉学主义”，也为国人重新认识“汉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参照，揭示了西方主导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中国（学）”的诸多隐而不现的话语规则，其主旨乃是强化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②

不仅在知识领域，即使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不少带有本位文化优越论的说法，诸如中国人常说“洋鬼子”、“大鼻子”、“金毛”、“老毛子”、“小日本”、“高丽棒子”等，这些对他者的称谓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本位文化优越论。当然，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优越感与上述自觉地贬低他者以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有所不同，这里有一个跨文化中的有意误识与无意误识之差异。^③从跨文化交流来说，自己的总是好的，别人总是不如自己，这种价值观似乎是跨文化交往中与生俱来的无意识取向。这表明，不同文化的特异性往往会放大自我而贬低他者。

以下我们从跨文化心理学的一些发现来具体讨论。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存在着跨文化交往中的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人们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看其他文化”的。另外三条原则依次是：第二条，一些心理学原理是普遍的，一些则具有文化特殊性；第三条，一些文化的核心维度有助于我们对跨文化现象的理解；第四条，尽管

① [美]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10页。

② 顾明栋、周宪主编：《“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See also Xian Zhou and Mingdong Gu (Guest Editors), Special Issue “Sinologism and New Sinology: Discussions and Debate on China-West Stud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vol.49, No.1 (2018).

③ 参见周宪：《跨文化研究与汉学主义》，《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跨文化研究者发现许多文化差异，但不同文化的共同性要多于差异性。^①这四条基本原则构成了跨文化交往甚至研究主体的心理取向，也是人们借以展开跨文化交往和研究的基本规则。第一条是对文化特异性的确证，相当程度上说明了特异性是人看待外部世界他者文化的基本视角。问题是，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看待其他文化，会不会导致文化误解、误识和偏见呢？跨文化研究中的有意误识恰恰是利用了这个原则，比如前面提及的西方学界的“东方学”研究，利用显而易见的文化特异性及其自我视角的必然性，使得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观念成为自然而然和必然如此的，进而取消了人们的质疑批判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条原则是一个系统，彼此相关并相互作用。如果说第一条是强调的本位文化视角的必然性与重要性的话，那么，第二条则指出普遍性与特异性同时存在，而第三条则指出文化特异性实质上是由每种文化核心层面所奠定，只有抓住这些核心层面才能把握特定文化的精神内核。最值得思索的是第四条，它指出虽然不同文化各自具有特异性，但是跨文化研究却发现共同性要多于差异性，这印证了第二条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的确证。这是否意味着有一些策略或视域可以纠偏第一条自我本位视角的局限性呢？是否意味着在跨文化交往及其研究中，存在着从文化特异性走向文化共通性的可能呢？

假如文化共同性多于差异性是一个真命题，那么，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在提醒我们，透过自我视角看世界可以从特异性中发现共同性，所以求同存异才成为跨文化乃至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思路。跨文化研究的无数例证表明，差异中确实存在着共通之处，但不可忽略的是，共通之处中又隐含着差异性，此乃不同文化跨文化交往互动的辩证法。那么，如何去发现这些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呢？也就是跨文化研究如何实现“跨”？

① Kenneth D. Keith, 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Blackwell, 2011), p.12.

三、从“文商”到“视域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心理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概念，其中一个热议的话题是所谓“文商”或“文化智识”（cultural intelligence, or CQ），它与“智商”（IQ）和“情商”（EQ）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完整能力。“文商”概念的提出清晰地表明跨文化交往的重要性，因为这一交往需要人们具备相应的“文化智识”，亦即跨文化交往的诸能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文商被界定为个体在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情境中有效运作的的能力，它最初是作为个体水平的建构，但也可用于各种水平的分析。文商与群体、团队、组织、甚至国族相关。”^①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文商”包含了元认知的（metacognitive）、认知的、动机的和行为的四个方面，或者说，有四种基本的“文商”。“元认知文商”反映的是获取和理解文化知识的精神能力，“认知文商”指的是有关文化一般知识和知识结构，“动机文商”说的是个体朝向跨文化情境学习和运作的活力或动力，而“行为文商”意指个体在多元文化互动中展现的合适的词语和非词语行为的能力。^②在我看来，这四种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完整结构，它们的有无反映出现实主体对跨文化交流的适应水平和操作水平。理论上讲，对从事跨文化跨文化研究的人文学者来说，“文商”也是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对这些能力的阐释，还需要上升到哲学层面来加以理解。此四种能力最终可以归结为“跨文化研究”中动词性的“跨”。跨文化研究迥异于本土性的文化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所谓“跨”，即超越原有的边界或限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里有必要引入加达默尔哲学阐释学“视域”观念来加以阐发。

① Editors Soon Ang and Linn Van Dyne,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Sharp, 2008), p. xv.

② Ibid., 5.

当我们说“知己知彼”时，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一种是自我认知，亦即从自我来看他者；另一种则是进入他者视域，从他者反观自我和他者。跨文化研究努力践行的就是从前者到后者的“跨”。即是说，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越出自我的藩篱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多种文化或文化多样性的视域，从自己看自己到透过别人镜像来反观自己，透过他者的眼光来认识他者文化。这里不妨用加达默尔颇有创意的概念——“视域融合”来阐发。我以为，“跨文化研究”之“跨”，说到底就是视域建构及其变化，是从自我视域到他者视域再到自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因此，跨文化研究之“跨”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视域（或境界）。

首先，初始存在着一个自我的视域，也即跨文化心理学所揭示的“人们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看其他文化”，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本原性视域，这是由每个个体文化所形成的认知结构或知识结构所决定的。但这个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说明，可引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来分析。依据皮亚杰的看法，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不断平衡的关系，儿童的智力成长体现为其不同阶段的认知“格局”（或图式、范畴等，schema）的发展变化，而这一过程呈现为“同化”与“调节”两种过程的交替，体现为人与环境刺激之间的不断平衡关系。所谓“同化”，就是用现有的认知能力和结构来理解或阐释所面对的现象，所谓“调节”意指现有认知格局无法理解和阐释新的现象，因而引发格局的调整与变化。^①这可以说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基本逻辑。跨文化研究者初始总是以自我眼光来看世界，这就是典型的“同化”功能，即以现有的认知格局来处理跨文化的问题，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但又免不了会有当下认知的局限、误解甚至偏见。因此，“跨”出现有格局形成新的认知格局实属必然。当研究者进入他者文化，了解、体验、认知了他者文化的特异性后，便会引发原有的认知格局的变化，

① Jean Piaget,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8-9.

因为新的观念和方法引入了现有格局，导致了现有认知格局的调节和变化，建构出新的认知格局，这就是跨文化研究的第二种视域或境界——以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我并认识他者，这时，主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都会产生新的变化。这里可以举例说明，前面提到的19世纪中叶清官吏斌椿的《乘槎笔记》，就记载了不少中国人初出国门看世界的误解和偏见，但是，随着对西方世界理解的深入，随着观察西方文化的视角的变化，此后国人旅欧或旅美的游记，对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就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

当然，跨文化之“跨”并不是在获得他者反观眼光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和立场，准确地说，是通过他者眼光来修正原有的眼光，将其误解、误识和偏见有所降低或有所剔除。由此便进入了跨文化之“跨”的第三视域或境界——自我与他者两者的“视域融合”。加达默尔在论述历史文本当代阐释时指出，过去的文本有其历史语境，它蕴含了其形成时期的特有的历史视域（或文化或期待）；然而，当下阐释者对历史文本的研究和阐释，又内含了他或她所处的当下的视域。简单的做法是不顾两者的历史距离，要么摒除当下视域回复到历史视域加以阐释，要么以当下之见来阐发历史文本。在加达默尔看来，两种做法均不妥。正确的做法是将两种视域融合起来。他写道：

当我们的历史意识置身于各种历史视域中，这并不意味着走进一个与我们自身世界毫无关系的异己世界，而是说这些视域共同地形成了一个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这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着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了一种视域。……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之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表示了这一

点，因为它表达了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的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越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①

在不断地同化与调节进程中所达到的这个“大视域”，超越了个别性而达致了“普遍性”，因而在更大的整体性中获得了更正确的尺度去审视。

因此来解释跨文化研究之“跨”，其要旨在于建构一个既保持自我又兼容他者的融合之视域，它的内在逻辑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一种“普遍性的提升”，一种“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是诸多“视域共同地形成了一个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这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着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

从“文商”到“视域融合”，是从哲学阐释学角度重新定义了“文商”，这也就重新阐释了知己知彼的认知路径，指出了跨文化研究之“跨”何以可能的问题。回到开篇爱因斯坦的箴言，若要在跨文化交往中避免人之愚蠢，培育并提升“文商”是必需的，走向自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亦实属必然。从“文商”到“视域融合”既是跨文化研究工作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实现文明互鉴的基本立场。

①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1—392页。